

论女性主义文学的男性关怀

严英秀

当今的女性主义文学话语中,男性已被置于万劫不复之境地。

但新时期伊始,第一代女作家是举着“爱,是不能忘记的”信仰旗帜走上文坛的。谁能不被张洁笔下那“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爱情所震撼呢?那个让女主人公至死不渝苦恋了一生的老干部,可谓是女性期待视野中完美的男子汉形象,代表了女性最高的爱情理想。这样的形象,对这样一个理想男性的精心构建,正是新时期初一代女作家的人生理想、爱情态度、及生命追求的最为直接最为显明的外化。

但很快,一种彻底决绝的失望和仇恨使张洁匆匆终结了“男性神话时代”,在《他有什么病》《只有一个太阳》《红蘑菇》《上火》等随后创作的一系列小说中,她毫不留情地抨击了男性世界的丑恶,让男人的灵魂与躯体赤条条地在女人面前曝光。与此同时,同时期的女作家们集体从“无穷思爱”的诗情中幡然醒悟,认清了“你将格外的不幸,因为你是女人”的残酷现实。她们就这样迈出了冲破传统价值观念和话语模式的第一步,其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建立在性别对抗的基础上,以及贯穿在女性对男性由失望——告别——愤懑——嘲讽的感情线索,和女性对男性由仰视——审视——鄙视——蔑视的认知过程中的。就像几千年的男性文学视野中,女性的形象不是被界定为“天使贞妇”就是“妖女荡妇”一样,男性的形象在女性主义文学营建的性别二元对立话语中,也是概念化的浅薄、懦弱、贪婪、低俗和恬不知耻。从对理想男性、对爱情的执着坚守,到对男性不留丝毫余地的戳穿、对爱情绝望的弃绝,女性主义文学的这种转向,虽标志着女性觉悟的程度和立场的自觉,但也昭示着难以言说和无处逃遁的伤痛。

张洁、张辛欣们已然在男女两性之间划开了一道无法弥合的壕沟,到了90年代,林白、陈染就走得更远了。她们甚至不再愿意讨伐男人的自私卑劣,在它们的文本中,不再有两性间的硝烟弥漫,只是不动声色的绝望。她们干脆利落地在自己的女性话语中驱逐了男人。她们塑造的那些美丽非凡的女主人公无法从心中从灵魂上接纳任何一个男人,全都“天然”地厌弃男性,拒斥男性社会。男人在女性的故事中只是一些拙劣的、暧昧的、模糊不清的影子,永远徘徊在女性经验之外,无力承担任何责任。女性的对面,不是男性而是永久的空白。女性们就这样生活在一个彻底抹煞了男性角色的时空中。她们高度自恋,从不期盼男人推

开门扉,而是以自足自娱的方式展开对男人的冷蔑与讥讽。在心性与才智上,高屋建瓴于男人之上,从不按照男人的意志行事,从来都不做悲悲切切临风洒泪对月伤怀的女人。这一代女作家创作的文本是清丽、妖娆、精致、内敛的,就像她们故事中的女人一样,但产生的破坏性却是巨大的、革命性的。她们以女性故事、女性命运让男人走开,表现了病态的复仇和女性本位的图腾崇拜,从而彻底颠覆了男性统治,颠覆了男性文化、男性历史。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世间真的有这么一栋阁楼、一座凉亭、一间卧室、一面镜子,可以密不透风地挡住外面世界的强光和阴影吗?自恋的武器能保护女人使之摆脱被几千年男权意识男性文化剥蚀的噩梦与悲剧吗?就算可以,在这样的人生中,女性能实现独立自主的愿望和理想吗?能真正完成女性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吗?女人们千辛万苦地反抗男人颠覆男人,就只是为了洁身自好、孤芳自赏,独自消受自我的美丽性感,过完凄清而诡秘、颓败的一生,然后香消玉殒?

应该说,林白、陈染这一代女作家的创作有明确的女性主义理论支撑,对男权文化的解构更彻底,其女性意识和立场是更自觉的。但她们远离人间烟火,很少观照现代女性生存的现实处境,对广大女界人生不具备太多的现实参照意义。女人驱逐了男人,也放逐了自我,她们是绝望而虚无的。她们拒绝男人和外面的世界将她们拯救出黑暗之渊薮,她们执拗地要自己掌灯照亮自己,然而那一星微弱惨淡的光只能照到她们摇曳的裙边。萧红感慨“女性的天空是低的”;在林白、陈染等女作家个人化写作的经典文本中,女性没有天空也似乎不需要天空。她们是重重帷幕后面的人。她们虽高度清醒却自恋自闭,对女性身份有完全的自我认同和觉悟,然而阴柔之风在闺阁里悄无声息地吹拂,除了撩拨起窗外“他者”的窥视之欲,不能造任何积极之势。

或许很多人在谈论女性主义文学时,会忽略池莉的名字。池莉不是女权意识很强的作家,也可能她的鲜明的世俗化倾向和写实风格多少掩盖了其女性立场。其实池莉对男性的贬抑态度是显而易见的,对男性主宰力量的否定也直截了当,并且池莉更具备了其他女作家少有的力度和胆识。她总是让她的女主人公们从根本上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并以现代女性极富目的性的行为摧毁男人的决定权。这种摧毁是通过否定男权文化下的成功男性模式进行的。池莉在《你以为你是谁》、《小姐,你早》、《生活秀》、《惊世之

作》、《云破处》等一系列作品中,都先塑造一个在世俗眼里极成功的男人形象,然后再塑造一个女性,彻底地粉碎他们,并取代他们的权力、金钱和智慧。池莉是极富个性的,在她笔下,女性形象总是比男性强大,她们是行动的主体,她们不像张洁作品里那些在男人的世界中四处碰壁、心力交瘁的女人们,也不像林白、陈染等所塑造的那些规避现实自我放逐的女人们。池莉笔下的女人们美丽智慧,冷酷决绝,有着敢于破坏一切旧秩序的勇气和力度。在讲述这些故事时,池莉的语调是那样从容不迫,眼角嘴边是一派气定神闲和无法掩饰的对男人轻蔑的笑:你以为你是谁?

可女人自己,又是谁?女人和男人的关系剑拔弩张到如此情境,还能有什么话说?难道仇视、抗争是唯一的方向吗?难道女性的性别意义和生存价值的凸现非得建立在两性对抗的基础上吗?女性主义到底是要以男人为敌,最终以女权代替男权,还是希望与男人一道争得人类的自由与繁荣呢?在几千年的男性霸权文化中,女人的形象被改写,话语权被剥夺,女性的历史被遮蔽,女性长久地“失声”。可是,如今在女性主义文学话语中,男人的声音不是也遭到了抑制,男人的形象不也是被改写了?

正如戴锦华所言,也许“我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由于我生而为女人,女性主义就不可能不是我内在的组成部分”。^①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立场,笔者深爱着本文论及的所有女作家,尤其是张洁和林白。她们所表达的失落、愤懑、仇恨、抗争,恍若都出自自我身心。因为身处男性文化的汪洋大海中,我真切地感知着水下的寒冷,那些矫情媚俗作幸福发嗲状的所谓女性写作,那些形形色色的“宝贝”的“躯体写作”,那些粉饰太平认为男女已彻底平等女性已被完全解放的“宏大叙事”,都是我所深恶而痛绝的。但我必须说出我另一种真实的感受,这就是:女性主义文学发展到今日,其自身一直未能走出的诸多误区中,男性关怀的缺失也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没有人可以否认,男女和平共处、和谐共处的世界是人类共同的最终理想。就连女性主义的鼻祖西蒙·波娃都说:“一切应该是完全对称的交流。”“两性之间最自然的是合作”。^②然而无休无止的两性战争在男女之间挖出了一条又一条难以逾越的壕沟,这碉堡与壕沟阻碍着至善至美人性之境的早日来临。当然,责任肯定不在弱势的一方,罪魁祸首是男性霸权文化,是建构这种文化、利用这种文化耀武扬威的男人们。但时至今日,是否也有女权立场过于激进、女性视角过于狭窄的因素?恩格斯说过:“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③这句话蕴涵的深刻社会意义足以让人冷静使人深思。池莉在《云破处》里,让女主人公以女性的仇恨结束了男人的无罪恶感、无良知的生命;林白让权势男人在女人的利刃下鲜血四溅,从而完成了女性“致命的飞翔”;香港李碧华的《纠缠》写了妻子用锋利的破唱片划伤了负心的丈夫;台湾的李昂在轰动一时的名作《杀夫》中更是用杀夫分尸回应了大男子主义的压迫。两岸三地的女作家不约而同地表达了杀夫的主题,逼上梁山,以弱杀强,不杀不足以平女愤!然而在这系列作品中,我觉得《杀夫》更为理性更为深刻。李昂不仅揭示了女性的苦难,

而且透过不自愿不平等的性关系导致的对人性扭曲的描写,揭示了男权主义带给男女双方的深重不幸。事实就是如此,在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里,谁能够独善其身?中国男权制度是女界所要批判和消解的目标。它在严重压抑和窒息女性的生存和发展的同时,也压抑窒息着男性的生存和发展。应该说,在政治权力层面上,男权文化确实显示着强大的统治力量,但在文化权力层面上,它也使得男性的个体人格及个性在重重精神枷锁中被定型与压塑成一致的模式,使男性深受其害且无处诉苦,它的反人道和灭绝人性是针对所有性别的。女性是几千年男权统治最惨重的受害者,但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正因如此,与其做过于长久的无谓的性别讨伐,不如从根本上进行制度的清算。在制度设计的缺陷中,怎样考验男人的公正、良知和品行呢?女性其实不应该再去计较再去记恨男人了,就像男人从来都不应该骑在女性头上作威作福一样。两性应并肩作战,共同成为古老的男权主义契约的叛逆者。只有这样,才能和解。和解是两性共同的祈愿,是唯一的通向澄明广阔世界的出路。必须和解,因为僭越途中的秘密穿越,男女相依相随才可以完成。若有朝一日,我们不再谈男权,不再争女权,而只为共同的人权携手前行,那才是社会文明进程的新起点,才是男女之大幸。

然而,和解与欣赏必须是双方的,追问与反省也一定应该是双方的。男性要想求和解,就决不能停留在年年一次“三八节”或者在政府的什么席上给女人留一个位子等等。这种居高临下的政策、口号和太多的表面文章上,更不能以伪装的宽容大度掩盖其内里的性别歧视。女人们不食嗟来之食,更不会再“回来”,回到男人的鞭子下或者软床上。男性要想与女性真正达成和解,就必须完成现有社会结构和民族文化心理的颠覆与重建,完成几千年意识形态的脱胎换骨。这在现阶段依然是十分艰巨的任务。而女性在负载自己沉重的历史重荷时,仅仅具备反抗意志和“到男人那儿去吗,别忘了带上阉割的刀子”^④的激进立场还远远不够。女性若缺乏反思精神品位和博大的人文关怀,将同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蹈悲剧性失败的覆辙。我们应该知道两性都不完美。男性霸权使整个人类史千疮百孔血泪交织,若再建构一个女权统治取而代之,势必也不会创造出什么平衡和美的新世界来。进入新世纪,如果女性创作依然以敌视抗争的姿态呈现,依然进行不是男权就是女权、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两性战争,那么世界的情势必处于难以调和的激烈状态,而人类的发展则难以为继,两性和谐发展的终极图景只能落于无以言明的虚空中。

也许,当以天下为己任的女性主义者,正在同依然笼罩着女性的男性霸权进行着集体的“一个人的战争”时,当我们的姐妹们满目苍凉艰难前行来不及抚摸自己的伤口时,两性和解和男性关怀的话题显得不合时宜。但为何女性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可以给男人理解、包容和支持,却为什么在应该最大程度地反映现实生活观照真实人性的文学中,坚持“一个都不饶恕”?我深信将女性写作的目光投注到男性关怀这一层面,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接受更新的女性观念的表现,是文化多元的标志。和解不是妥协,关怀不

是无原则的让步,不是再去重复古老的历史,而是更高意义更深层面上的达成共识,平衡互补,共荣共存。若不这样,又能对解构旧的男权文化系统建立新的和谐秩序发挥多大的建设性呢?这样的女性话语在驱逐男人颠覆男权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让广大女界的凡俗人生在自己的视野里渐行渐远了。因为,不管人们生存的花样如何翻新,其本质追求是一样的,爱情至今依然是也应当是人们水草丰美的精神家园。“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男人和女人注定是要相爱而且应该相爱的,可女性主义在挥拳击向男人时,用力过大过猛,其反冲力却击伤了女人自己。

所幸的是,已有相当一部分女作家在关注女界生存境况的同时,也接触到了男性关怀这个主题。可以说,女性写作终于向男性投去了温馨而深情的一瞥。从张洁同时期的女作家谌容的《错、错、错》到后来赵玫的《偿还》,张欣的《爱又如何》、《你没有理由不疯》、《此情不再》,到池莉的《午夜起舞》,赖妙宽的《消失的男性》,王小妮的《很疼》,铁凝的《永远有多远》等等。这些作品不再致力于挖掘和鞭挞男性的假恶丑,也不再让男人在女人的故事中缺席,而是给他们更多的理解和关怀。诚然,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的开放、观念的更新,可能给一些男性带来了机遇、冒险、财富和艳遇,但也使大多数男人面临着激烈的职场拼搏,身心不堪重负。现实生活中,不是有很多这样的男人吗?女作家们以女性的包容和厚道在作品中塑造了这些男性形象,肯定了他们的付出,对他们人性的弱点没有尖刻的冷嘲热讽,而是同路人无言的同情和体恤。生命里没有浪漫传奇、快意恩仇,平凡的男女相互搀扶着艰难地行进在一地鸡毛中。除了那些看不到人间疾苦的款爷富婆,踩空在生活之上永远神思辽远“生活在别处”的“思想家”“理论家”,谁能说这不是当今生存中的男女故事的真相?

也许张欣的作品算不上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文本,但她一直试图在创作中重新审视女性命运,探讨两性关系在

商品经济大环境中的出路。中篇《爱又如何》的男女主人公相爱结婚后开始面对家庭事业的诸多考验,职业不稳定,加上买房、赡养老人,生存压力使他们逐渐情感麻木。然后有一夜,奔波的妻子看见丈夫的摩托车后座上是一个长发飞扬的女孩。她震惊、伤心、愤怒,女权情绪像冰山凸现在水面。但接下来她跟踪丈夫时却发现丈夫的身后是不断变换的新面孔。原来,丈夫是利用睡觉时间出去载客挣点钱,而妻子却在第一时间那么万念俱灰地认定丈夫有了外遇。贫贱夫妻百事哀,爱又如何?爱如此容易被怀疑被伤害,爱不再是不渝的信仰,爱又如何?

想要一种纯净的和谐的关系,没有创痛不受到伤害不疑不弃的关系,难道没有可能吗?到底是谁置男女于“爱又如何”的困境?当然,女性是无辜的,女性在当今的社会变革中并未改变其特有的弱势身份,而是陷入了另一种尴尬的性别境遇。但如果,女性主义者看不到这一切背后的东西,看不到这个物化的社会最需疗治的顽疾最应铲除的黑暗,不从根本上完成“人”的解放,而总是停留在形而上的两性战场上,那就无异于大战风车的堂·吉珂德了。

注释:

①戴锦华:《个人经验与女性主义立场》,《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知识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82页。

②[法]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年版,第 478页。

③[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④李梦:《女性写作:逼迫“上帝”重新洗牌》,《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 1期,第 43页。

(作者单位:甘肃联合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黄莲

(上接第 65 页)

注释:

①罗荪:《“与抗战无关”》,《大公报》1938年 12月 5日重庆版。

②梁实秋:《“与抗战无关”》,《中央日报》副刊《平明》,1938年 12月 6日。

③巴人:《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文艺阵地》第 3卷第 1期,1939年 4月 16日。

④杜特莱:《莫言谈中国当代文学边缘化》,《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 2期。

⑤林林:《谈〈华威先生〉到日本》,《救亡日报》1939年 2月 26日。

⑥茅盾:《暴露与讽刺》,《文艺阵地》第 1卷第 12期,1938年 10月 1日。

⑦茅盾:《论加强批评工作》,《抗战文艺》第 2卷第 1期,1938年 7月 16日。

⑧茅盾:《八月的感想》,《文艺阵地》第 1卷第 9期,1938年 8月 16日。

⑨周行:《关于“华威先生”出国及创作方法问题》,《七月》第 4集第 4期,1939年 12月。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重庆抗战文史研究基地)

责任编辑 半夏